

中国
现代文学史
研究法

谢泳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
现代文学史
研究法

谢泳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 / 谢泳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95-0037-6

I. ①中... II. ①谢...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78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三河市燕郊镇圣屯)

开本:965mm×670mm 1/16

印张:13.75 字数:107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3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序论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 / 3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 / 27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类型 / 30
- 第四节 成型的与不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 41
- 第五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掌故之学 / 57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

- 第一节 搜集史料的意识 / 69
- 第二节 搜集史料的方式 / 76
- 第三节 旧书业与史料收集 / 85

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观

第一节 史料的开放性 / 91

第二节 域外史料的搜集 / 98

第三节 “政治运动”中的史料 / 102

第四节 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出版物 / 116

第四章 扩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先行规则

第一节 作家全集的使用 / 123

第二节 作家传记的使用 / 127

第三节 作家年谱的使用 / 130

第四节 作家日记的使用 / 134

第五节 作家书信的使用 / 142

第五章 扩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基本方向

第一节 文学年鉴的使用 / 147

第二节 文学辞典的使用 / 150

第三节 同学、职员录的使用 / 152

第四节 方志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 156

第五节 政协文史资料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 160

第六节 拍卖图录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 163

第七节 “影像”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 166

第八节	“校史”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 169
第九节	“广告”及“会议纪念文集”的使用	/ 172
第十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版本”与“书话”	/ 175
第六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应用的规范		
第一节	史料的首发权	/ 197
第二节	史料的共享权	/ 200
第三节	网络时代的史料规则	/ 205
结 语 / 208		
后 记 / 210		

第一章 序 论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

凡一门成熟的学科，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周传儒曾说：“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¹

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讲他不愿治经学，而愿意选择史学时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²

1940年顾颉刚为《史学季刊》所写发刊词中曾说：“故作考据者常以史观为

1 周传儒：《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页。

2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5页。

浮夸，谈史观者亦以考据为琐碎。近岁以来，辩争弥烈。然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查，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烂，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¹

陈寅恪、周传儒和顾颉刚这里所说的材料，我们大体上可以视为文献，今后我们不论研究对象有什么变化，养成史料先行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史料先行就是：凡做研究，先以整理相关研究对象的完整史料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在熟悉相关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产生研究方向，在此前提下，再选择研究的基本方法，无坚实的史料基础，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难作出一流的学术研究，只有在熟悉已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谈到发现新史料，新史料是相对旧史料才存在的，不熟悉旧史料也就无法判断史料的新与旧。

强调史料的第一性并不意味着说史料即是史学，而是对史料重要性的一个判断。因为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者自行重建历史，重建历史的是历史研究者的思想能力，是研究者的人生理解和社会体验的综合表现。史料本身是客观的，不变的，但研究者对史料的判断和理解则不断在变，因为他的思想在变化，他对人生的体验在变。其实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客观的史料和研究者的思想总是交织在一起，离开史料的思想是无力的。

材料和史料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材料是客观存在，它所以能成为研究史料，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一是直接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材料，这种直接的材料相对容易判断，二是可以与研究对象建立史料关系的材料，也就是说，那些表面看起来与研究对象没有关系的材料，一旦能与研究对象建立史料关系，这种间接的史

1 《史学季刊》发刊词，1940年。

料，也就成为一种直接史料，能在一般材料中建立与研究对象的直接关系，是新史料产生的一个重要思路。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具体说明。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研究是最成熟的，文献积累也最完整、最有体系。一般说来，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再发现直接史料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是极少了，这种发现只能建立在偶然性上，所谓可遇不可求了。不过在直接史料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从间接史料中，再扩展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史料呢？我以为还是可能的。比如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的教科书问题。如果我们能寻找到比较准确的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学习过的教科书，然后从这些教科书中的语言和现代知识方面，结合鲁迅的作品，细读文本，比较鲁迅文体的变化，分析鲁迅现代知识建立的途径，就有可能更深入理解鲁迅白话文的最初来源以及他学习过的教科书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现代知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

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他先到弘文学院，主要是学习日语，再到仙台医学院。要了解鲁迅在仙台医学校的情况，有鲁迅自己的名文《藤野先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直接史料，而弘文学院编制的《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就是间接材料，如果能在这套讲义材料和鲁迅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史料关系，这套讲义材料，就可以成为鲁迅研究中的新材料。

据“东亚公司发兑新书目录”记载，这套讲义的全称是《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监辑，清人王廷幹先生外七家译）讲义目录如下¹：

1 农学士八锹仪七郎、农学士石崎芳吉同著：《家畜饲养泛论》，东京：东亚公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

本讲义录系日本专门大家二十余家所讲说诸家分科专门将其所讲授之稿本精益求精再三订酌以成是书一翻是书则诸家之音容仿佛现在于纸上有躬亲在讲堂听渊博之讲说之思矣加学界多书良好是书则所未有也。本讲义录所载科目开。

《伦理学》、《日语日文科》、《世界历史》、《地理学》、《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法制》、《经济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

这套讲义初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是由原来弘文学院各科的讲义翻译成汉语的，前有当时中国驻日本大臣杨枢、曾做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和日本知名政治家长冈护美的序言各一篇，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也专门写了一篇《刊行讲义录要旨》，专门介绍出版讲义的意图。讲义前面附有当时弘文院校舍的多幅照片，特别是有当时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照片。

当时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分为普通科和师范科，鲁迅在普通科，两科的讲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有些科目是相同的，而这套讲义可能是两科所有讲义的合辑。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多和弘文学院有关，如黄兴、陈氏兄弟（师曾、寅恪）等，所以从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可以寻找早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来源，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类似的日文学习教科书比较有名的还有《东语完璧》

和门马常次主编的《文法应用东方汉译规范》，当时弘文学院也用这个教本，该书前也有院长嘉纳治五郎的序言，因为这个教本中有些课文是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类型等，所以这些早期现代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对学生会有影响。

《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中有松元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这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的基本教材。松元龟次郎曾回忆过，当时周树人、陈介和厉家福诸氏虽都还不满二十岁，但他们的汉文根底都很深，协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松元龟次郎说：“周树人就是后来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他从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在这方面的特长；他所译的日文，不但简练，而且还充分体会原文的风趣，译得十分稳妥而且流畅。当时他们同学间对他都极为推崇，目为模范。”¹ 据松元龟次郎20世纪30年代末一篇文章中回忆²：

我教过的普通班浙江班的学生中，我还能记起的有几年前去世、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就是周树人兄弟，和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的陈介等人。我教他们时，因为他们已经学过一段时间的日语，所以都有相当的水平了。开始我给他们讲日语文法时，用相同意义的汉语来作说明。有一次讲到日语助词“に”译为什么汉语最合适时，我在黑板上写了“於”和“于”两个汉字，说这相当于日语助词的“に”。当时有一个叫厉家福的学生（后来在金泽医科大学毕

1 朱志清：《鲁迅的另一位日本老师》，《文汇报》，1982年6月10日。转引自倪墨炎：《鲁迅的社会活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2 杨正光、平野日出雄合著：《松元龟次郎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业，回国后在30年代曾以中国医学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在日本举行的日华医师联合会）站起来指出说：用不着两个字，“於”或“于”用一个就可以，因为“於”与“于”通，两字同义。我当时的确不知道这一点。厉说完，鲁迅（周树人）站起来说：“於”、“于”两字，一般情况下作同样用的，但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相同，不过在“に”译成中文时，用那一个都可以，在这时两者是同音同义的。他们两人的话，给我印象很深，至今还能记起。因为那时我觉得，对于汉字的用法、汉语的区别，还得请教汉字祖国的中国人，单靠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那时候周树人、厉家福都不满二十岁，但他们在汉文方面的水平已很高。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回忆说，1902年初秋他到弘文学院时，鲁迅比他早到半年，也正在那里预备日语。¹

根据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可以确认鲁迅依靠《日语日文科》学习过日语，至少是同类教材中鲁迅用过的一种。松元龟次郎在讲义一开始就说：

近时清国学士大夫，翕然倾意于新学钻研，不远千里，东来就学者，以万计。顾日语日文者，修诸学科之关键也。是以日语会话，日文典、日语用例等之书，公于世者，不啻汗牛充栋，陈陈相因，如食大仓之粟，独未有文语用例一书，是诚学界之一大缺陷也。余久思编述，而未果。偶我弘文学院，有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发行之举，

1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2页。

而余担当其日语日文科。自今按月讲述许多文语用例，从易入难，由简进繁，务与口语用例，相为联络，兹特举以问世，聊供学者讲学之便，读者谅其意可也。¹

在鲁迅研究中，早期《日语日文科》讲义的重要性，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一是它例句中所使用的翻译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白话文，有些句式和词汇的使用，可能与鲁迅有关，松元龟次郎回忆中曾说过，鲁迅在这方面帮助过他；二是这本日文教科书的例句中，有很多现代政治的内容，比如关于议会的说明有好几处（主要是关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议会知识，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体制方面的知识），作为青年人早期的思想来源，这些内容虽然是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但一般来说也会留在人的记忆中。也就是说，第一项，有可能影响了鲁迅对白话文的自觉，他最早能用白话写成《狂人日记》，与他早年学习日文经历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松元龟次郎的这本讲义说得很明确，是要将“文语用例”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日语日文科》中的语言实例，以采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例子为多，特别是《论语》、《孟子》和《史记》中的语言材料。有些用法已相当口语化，如果我们把书中的例子完全和鲁迅文字中的行文习惯对应研究，或许能从中发现鲁迅文体的特征。鲁迅在《写在〈坟〉的后面》中曾说过：“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² 第二项，日文教科书中的知识内容，有可能在现代知识方面

1 松元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第1页，见《弘文学院师范讲义录》，东京：东亚公司发兑，明治三十九年（1906）。

2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86页。

潜移默化影响过鲁迅，这对我们以后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真正来源有帮助。下面我抄录《日语日文科》中一些典型的例句句型：

何处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乎？温带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

何处国土是位于温带地方乎？世界文明国皆在温带地方。

石炭多在何处地方采掘乎？石炭多在九州与北海道采掘。

生丝多产在何种地方乎？生丝多产在长野县与群马县。

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

余他日将从事矿山。

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

理化学之研究，今后当倍开。

来月上旬辽河当结冰。

此船回航再归来日本之时，想上野向岛之樱花当满开矣。

在这些例句中，可以明显看出由浅近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有意思的是例句：“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完全与鲁迅的经历相合，如果这个事实成立，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起这套教科书与鲁迅的联系，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深入展开鲁迅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地质略论》是鲁迅早期的一篇文章，它的具体来源，鲁迅本人也曾说过：“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

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他们的老家。”¹ 如果了解弘文学院的教科书，多少可以发现一点“他们老家”的线索。

鲁迅在《中国矿产志》的“例言”中说：“篇中专名为多，而中国旧译，凡地层悉以数计，今则译其义若音，地史系统亦然。”鲁迅同时列出了这样一张表格²：

（一）原始代

（1）片麻岩代

（2）结芯片岩纪

（二）太古代

（1）康勃利亚纪

（2）希庐利亚纪

（3）迭伏尼亚纪

（4）煤纪

（5）二迭纪

（三）中古代

（1）三迭纪

（2）侏拉纪

（3）白垩纪

1 《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页。

2 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原文后有英文原名，为简明此处省略。《鲁迅全集》第8卷中收入的版本虽然稍有差异，但不影响本文的基本判断。